



文・圖——楊志剛（鄒族語言推動組織理事長）

民族言語復興に取り組む言語推進組織の役割における課題
The Dilemmas of Indigenous Language Promotion Organization in
Advancing Indigenou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

語推組織在推動族語復振中的角色困境

鄒族語言推動組織自民國109年（西元2020年）成立後，逐步建立審查小組與共識會議制度，讓族語推動從過去依賴個人經驗的模式，轉向制度化、程序化與可檢核的治理機制。本文依據109年（2020年）至114年（2025年）之成果，整理該組織功能、成果與限制，並結合族語織網項目議題來反思，提出族語發展的展望。

族語政策與部落現場

我常常在想，這幾年語推組織在協助族語復振的角色中，到底算不算成功？如果用計畫成果來看，我們可以列出很多漂亮的數字：辦了多少場研習、開了多少次會議、完成多少份教材、審查多少件文本、共識會議參與人數甚至達成率超過百分之百。但只要回到部落日常生活，就會發現另一個更直接的現實：孩子們在家裡說族語的機會依然有限，年輕族人多數仍以華語為主，長輩的語言世界越來越像孤島，而族語工作者的壓力一年比一年沉重。

也正因如此，我越來越相信，族語復振不能只看「做了多少」，而要看「制度能不能撐得住」。族語復振不是口號，而是一場政策運作能力的考驗。當族語進入教材、公部門文件、公共標示與站牌，甚至進入AI系統時，它就不再只是家裡說話的工具，而是公共制度運作的一部分。

共識會議作為公共語言的門檻

鄒族語言推動組織成立後，開始建立審查小組與共識會議制度。對外人來說，這可能只是行政流程；但對我們而言，它其實是鄒語能否走進公共領域的門檻。因為我們面對的不再只是單純語言復育，而是更棘手的問題：達邦與特富野兩社在語音、詞彙與使用習慣上本就存在差異，而這些差異一旦被放進教材、站牌或考試制度，就容易被放大成「誰才是正確的」的爭論。語言差異原本是自然現象，但一旦進入制度，就會變成公共決策問題，也會成為必須被協商與承擔的共同責任。



2025年Mayasvi祭典籌備會，青年參與協助並發言建議。



2025年Homeayay文化見習營隊，親子共同學習小米酒製作。

語言差異原本是自然現象，但一旦進入制度，就會變成公共決策問題，也會成為必須被協商與承擔的共同責任。



我曾在共識會議上聽過長輩說：「以前我們就這樣講，為什麼現在要改？」也聽過年輕族語老師說：「如果沒有統一規範，我們根本不知道怎麼教。」這兩句話，其實就是鄒語復振的核心矛盾：長輩追求的是語言的自然延續，而教育體系追求的是標準化與可教性。語推組織的角色，就是在這個矛盾之間找到一條可以運作的路。

從109年（2020年）至114年（2025年），我們累積了大量文本成果，包括朗讀稿、學習詞表、族語E樂園例句、鄒語輔助教材、十二年國教課程鄒語文教材與公共標示翻譯。如果只當作計畫交付物，它的價值會被低估；但若放在制度建構的角度，它其實是一套逐步形成的語言基礎建設。因為語言復振是要讓族語成為能被使用、引用與複製的公共語言。沒有文本，就沒有擴散；沒有審查，就沒有可信度；沒有共識，就沒有公共使用的正當性。

從文本累積到制度治理

我認為語推組織最重要的貢獻，是讓鄒語推動逐漸走向「制度治理」。過去語言推動常依賴少數熱心人士，一旦這些人退下或疲乏，

成果就容易中斷。但審查小組、共識會議與顧問團建立後，至少讓每一次用字、拼寫與地名翻譯都有可追溯的討論與決議依據。這些看似繁瑣的程序，其實是在建立能被族人共同信任的制度基礎。

公共標示與地名翻譯便是明顯例子。例如台18線地名標誌錯誤事件，表面上是文化能見度提升，但若缺乏共識或翻譯錯誤，族人立刻會質疑：「這是誰決定的？」後來交通單位主動召開共識會議修正，事情才算告一段落。那次事件讓我更確定，族語進入公共空間，就等於進入公共決策現場；族語被印在路牌、站牌、公告與教材上，就必須準確、必須一致，也必須能被信任。

我也越來越清楚感受到，書寫規範未定是根源性瓶頸。它不只是拼音選擇，而是牽涉兩社差異如何並存、音系符號如何處理、教材與考試能否一致。若規範長期不穩定，教育現場就只能各自判斷，最終造成學生混亂，甚至族



對語推組織而言，新創詞不只是「把中文翻成族語」，而是要在可理解、可接受、可延續與可被制度採用之間取得平衡。這項工作做得很辛苦，也最容易暴露族語組織網中詞典、教材、公共使用與社會共識之間的斷裂。



誤，也可能讓語言知識脫離族人的掌握。這說明語推組織未來不只要做語言審查，更要參與數位治理。

從族語組織網看語推組織的補位角色

若從本期「族語組織網」所提出的19個項目



2025年Mayasvi文化見習營，Fkuo（護身籤條）製作活動。

人之間互相否定。

113年（2024年）起，語推組織與國網中心及高師大合作推動AI語料與自學系統，這是一個重要突破，但也帶來新的問題。AI的核心是語料，而語料涉及文化主權：哪些內容可以公開？哪些需要限制？資料誰擁有？錯誤誰負責？如果沒有制度，語料可能在無意間被外部使用甚至被商業化應用，這是未來必須面對的問題。當語料進入數位系統後，是否仍能維持族群主體性與文化脈絡。若缺乏清楚規範，AI可能放大錯

來看，鄒族語言推動組織其實正位在許多重點的交會處。語推組織不是單純辦活動的單位，也不是只負責翻譯的臨時窗口，而是在詞彙、教材、認證、競賽、營隊、公共標示與新創詞之間，不斷協調、補位與承擔壓力的中介組織。只是，這些工作看似都與族語復振有關，實際執行時卻常常呈現「樣樣都碰到，樣樣都不足」的狀態。

其中，最常被要求、也最耗費心力的工作，便是新創詞與公文翻譯。近年政府機關、學校、地方單位或公共標示需要族語翻譯時，往往第一時間想到語推組織。然而，公文中的詞彙多半不是過去部落日常生活中的傳統詞彙，而是行政制度、法律概念、政策名詞或現代公共事務用語。這些詞不但難以直接對應鄒語，有時即使勉強創造出新的詞句，也未必能被族人自然理解或實際使用。對語推組織而言，新創詞不只是「把中文翻成族語」，而是要在可理解、可接受、可延續與可被制度採用之間取得平衡。這項工作做得很辛苦，也最容易暴露族語組織網中詞典、教材、公共使用與社會共識之間的斷裂。

在教材方面，鄒族語推組織雖然參與相關文本審查與意見提供，但在現行制度下，並沒



2025年Mayasvi文化見習營，方長老族語授課，莊長老在課堂共同解釋祭儀內容。



2025年Mayasvi文化見習營結業式。

有足夠人力與資源自行發展完整教材。這使得語推組織比較像是教材系統旁邊的支援者，而不是教材生產的主體。不過，在族語認證學習上，語推組織仍可發揮實際功能，例如協助整理詞彙、提供例句、辦理增能課程，或協助學習者理解認證內容與部落實際語用之間的差異。換言之，語推組織雖不能完全取代教材編輯機制，卻可以在教材、認證與學習現場之間扮演補強角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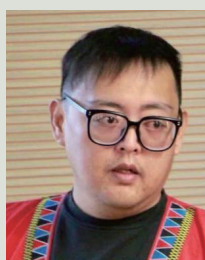
在語言競賽方面，語推組織也能提供一定程度的協助。無論是承辦族語相關比賽、協助學生練習、提供講稿或詞句諮詢，都能讓競賽不只是學校單方面的任務，而能與族群內部的語言資源連結起來。暑假期間辦理的族語育樂營，也是一個重要環節。它雖然時間有限，卻能讓鄒族孩子在較輕鬆的環境中接觸族語，補足學校每週課程時數不足的問題，也讓語言學習不只停留在考試與競賽。

語推轉型與未來展望

最後我想補充一點，也是近期各族語推動組織感受到的共同處境：突然面臨的語推組織轉型，並非單純的組織優化或內部調整，而是在政府政策方向調整之下所帶來的制度性變

動。也因為政策推動與制度設計改變，使原本已運作多年的語言推動架構，必須在相對有限的時間內重新整合與轉換，這當中自然伴隨不少挑戰。

我相信，唯有當政策設計真正納入「延續性」與「族群主體性」的考量，語言復振才不會在制度調整中被反覆消耗。鄒族語推組織的經驗提醒我們：族語復振不是只靠熱情，也不是只靠計畫數字，而是要建立能被族人信任、能跨世代延續、也能面對公共化與數位化挑戰的制度。唯有如此，族語才能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持續累積、深化，並真正回到部落生活之中。◆



楊志剛

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村人。鄒族。1984年生。學士。現任嘉義縣阿里山鄒族達邦庫巴文化發長協會/理事長、達邦社文化協會理事長。曾任達邦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、林保署共管會議委員。長期從事鄒族文化保

存與族語復振工作，投入部落文化治理、社區組織運作與公共事務協調，並參與跨機關合作與資源整合工作。